

■弘扬家国情怀

中国古代文人的家国情怀

□刘金祥

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国爱家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这不仅深刻阐释了维系中华民族赓续演进的重要精神力量之所在,而且对新时代中华儿女勤勉奋进、砥砺前行报以深深期许。家国情怀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标识,是每个炎黄子孙对华夏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和崇拜,是全体社会成员对民族大家庭的一种坚守和护持,是一种即使国家置身危亡绝境民族身处苦难险境而终能慨然不败的精神基因。在中国古代,家国情怀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国人从情感和理智上认同和维护民族共同体、将爱家敬长这一天然血缘亲情上升为报效国家服侍黎民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一代代文人士子怀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遵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操守,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志向,以家庭为根基,以天下为己任,竭诚担当,躬笃作为,谦恭自律,严谨持家,以光耀千秋的道德文章和福泽百姓的勤政善举,书写着绵长醇厚、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

忠孝一体、家国同构是古人家国情怀的核心要义

家国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质素和闪亮因子,是华夏儿女最真挚的情感归宿和最浓烈的精神底色。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国与家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孟子·离娄上》曾做精辟阐释:“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换言之,家国情怀是建立在血缘和亲情基础上的一种社会伦理关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家国情怀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出经世济民的中国古代文人忠孝一体、家国同构的人格追求,而这种人格追求又是以齐家修身为前提的,正如《大学》所言:“欲知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是家国情怀传承流布的内在动因和基本条件。有鉴于此,古代许多开明之家贤达之士恪守“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信条,注重以家训家规来告诫家人和子弟,以诗词家书来蒙养门生和后人,启发和引导他们勤学奉公、崇德向善、敬业乐群、恤民效国。例如被视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楷模的范仲淹,先后编写了《戒诸子及弟侄》《六十一字族规》《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和《义庄规矩》等家训族规,以此濡染和教化范氏子弟和族人,其后又经其子范纯仁不断调整完善和亲身指导实践,使得范氏家族后世才俊辈出,很多成为对国家贡献卓著的栋梁之才。再比如《诚伯离书》《朱子家训》《颜氏家书》《包拯家训》《海学说》《袁氏世范》《朱子家训》和《弟子规》等经典家训家规,大都围绕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整齐家门,提撕子孙”的作用,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颇具特色的部分,成为中国古代涵育家国情怀的重要宝典。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是一种情感诉求和心灵皈依,不如说是一种生命自觉和文化承续。无论是《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还是《岳阳楼记》中先忧后乐的责任担当,抑或是《病起书怀》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驱动,家国情怀往往与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紧密相连,与情真意切的诗章文牍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文人是在几千年风雨火火中熬炼出来的特殊分子,家国情怀不仅融进他们的血液里,而且递嬗为他们的人文基因。这些基因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使中国古代诗词既蕴含着眷顾家庭的孝悌,又凸显着报效国家的忠贞,不绝如缕地传承着中华文脉的“道”统。古往今来,书生诗心容天下,忠贞见笔端。我国

中国的语言文字存在于人类历史数千年,被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作为母语使用和发展,已到至臻至美、出神入化的境地。它向外传播信息,于内又黏合情感。不管身在天涯海角,张口一句汉语,便知你从故乡来。

母语是人们生命元素和生活个性的展示

汉字是这个星球上最复杂的语言符号之一,其语感、节奏、指向,包括音韵的高低变化和长短轻重,都代表不同的表达。我们的警句格言、书法挂件,这些精短的文字,以音乐般的节奏进入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它不仅是美,也是文化,它已经成了人们生命元素和生活个性的展示。要把握汉字的韵律、节奏、指向,没有血脉里的基因,没有数十年的浸润,根本写不出汉语言的味道。

有人断言,中国未来的作家不太可能站得比唐诗更加高远。因为唐朝的诗人们一生都在穷尽文字之美而心无旁骛,今天繁杂的学问,让作家们失去了对汉字纯正而深刻的把握。知识的丰富恰恰让作家们处于能解读,却不会创造的尴尬状态:能分辨文字的低俗,却不能使自己的文字范围宽广;

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邶风·击鼓》篇记载:“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其本意是指战友们相互约定“奔赴疆场共生死,终生相伴不离”,后来鉴于诗中蕴含着“死生契阔,与子偕老”的情感意蕴,遂逐渐演化为对圣洁爱情与和谐家庭的吟诵与祝福。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礼记》“儒行”篇教导儒生“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于两千多年前就将中国儒家的人文理想融入个人价值取向之中,成为鞭策历朝历代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箴言和信条,晚清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林则徐还将这一信条发扬光大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从政理念。三国时著名诗人曹植在《白马篇》中写下“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句旷世名言穿越浩茫历史时空砥砺后人矢志保家卫国。

唐诗中的边塞诗是唐诗中思想性最为深刻、艺术性最为奇崛的部分之一,其中体现家国情怀的诗作更是让人为之惊叹、动容和感奋,有高适“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的愤激骏切,有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昂扬豪迈,有李白“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刚烈决绝,有杜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的洒脱从容,有李贺“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慷慨悲切,有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洒脱坚毅,有张为“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忧”的慷慨激昂,有令狐楚“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天望故乡”的深沉凄婉。这些振聋发聩的醒世励志诗篇,不仅是诗人也是炎黄儿女女性报国情怀的生动体现,律动着作者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价值理念。

国家统一、民族兴盛是古人家国情怀的终极价值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古代文人借诗言志、以文咏情,诗词歌赋成为他们表达家国情怀的重要方式。两宋时期,家国情怀成了彼时诗词的基调和主旋律,其中张扬爱国主义的优秀篇章更为后人所推崇传颂。家国情怀的词语以“豪放派”为主,而“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则为苏轼,正是苏轼一方面彻底摒弃了传统词体表达范式,破除了“诗言志”而“词言情”和“诗庄词媚”的风格界限,另一方面将充盈家国情怀的诗词创作推向巅峰,正是这种艺术表现使苏轼成为有宋一代词人中展现家国情怀的先锋和重镇。南宋由于北方国土尽失山河破碎,涌现出一批爱国主义诗人词人,陆游是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陆游诸多诗词作品中,浓郁的爱国情怀像一根主线深蕴并贯穿始终。“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概括了陆游平生的心愿和志向,其忠贞勇毅令人钦敬和仰慕;“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承载着作者收复山河的心愿和梦想,涌动着诗人驰骋疆场的激情与豪情;“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临终前陆游仍然魂牵梦萦复兴大业和国家安危,耿耿忠心与日月争辉,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已内化为陆游的一种生存方式。与陆游比肩齐名的南宋爱国词人当属辛弃疾,辛弃疾是南宋政坛上一位壮怀伟志的豪杰,也是当时词坛上一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泰斗级人物。纵观辛弃疾的一生,恢复中原收复失地也是其诗词抒写之原点和状摹的重心。辛弃疾虽不是久经沙场的骁勇悍将,但却多有咏史之悲怀古之殇,其所作《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等名篇佳构,笔力雄健,风格奇崛,浸透着对故国土地和亲人的热爱和眷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通过描写戎马生涯和军旅场景,表达了词人意欲力挽狂澜、希冀重整河山的理想追求;“追往事,叹今吾,春翼难整白头须。岁月不居,时易流逝,家国情怀不仅是永恒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坚守母语的尊严

□赵伟

能看透文章的浅薄,却不能使自己的文章深厚;能体味到唐诗的美妙,却写不出美妙的唐诗。

母语的的品质贯穿了人文精神

中国历代文人对母语的创新比比皆是,唐诗写乏了出现宋词,宋词写到尽头出现元曲。

几千年来,中国朝代更迭,政治体制变化无常,但是中国的人文精神却从未改变,并随时间推移愈发顽强。中国文人独立的个性和品质经过几千年的锤炼,深入骨髓,成为基因。“不受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些品质,需付出生命方能得以彰显:即便饿死也不受嗟,即便杀头也不折腰——这是真正的文人品质和独立人格。

家为重,不计个人荣辱春秋大义;“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抒写了作者“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坚贞品格;“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发生”表达了作者壮志难酬、英雄迟暮的悲愤心情。

忧患意识、入世精神是古人家国情怀的重要标识

阳刚与阴柔是我国古典美学的一对重要范畴,阳刚美的特点在于动态和力感,阴柔美的特征则在于静态和柔媚。宋代诗词明显地呈现出这种美学观念,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风格——豪放与婉约。婉约同样能够准确生动地传递家国情怀,宋代婉约派诗词的代表性人物是李清照她不仅是一位才华盖世的女词人,更是一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的深具家国情怀的女中豪杰。李清照对时局命运的忧虑和关注常常隐含在家国之思、故土之恋、时局之忧及个人凄苦的抒写中。“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作品既以浓重忧伤的婉约笔调抒发家愁国恨,更以伟岸高迈的豪放手法感叹故国山河破碎、徒成半壁,使人们看到“婉约派之宗”悲怆刚健的另一面。“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诗作慷慨雄健、掷地有声,是一种精髓的凝练和气魄的昂扬,是一种所向无惧的人生态姿,这种凛然风骨、浩然正气,长存于天地之间。

在国家祥和安宁、政治尚属清明的承平年代里,尚有范仲淹等文人士子怀揣济世之心挥笔写就了激发后人心智的优秀作品;而当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更有一批投军御敌的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垂范后世的不朽篇章。南宋末年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一诗中写道:“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诗人把自己命运和国家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国之不存,家将焉附”,诗人誓死不降元军,最终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明清两朝时而边关吃紧时而海防告急,中华民族之血性日愈浓稠与贲张。1449年,明朝军事家、政治家于谦带领明军大败瓦剌迎回明英宗后,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石灰吟》,其中“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句垂青后世,彪炳万代。明朝末年和清代晚期,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爱国志士们再次奏响了抗敌救国的主旋律。陈子龙的“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夏完淳的“缟素酬家国,戈船决死生”,黄遵宪的“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谭嗣同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梁启超的“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煮不平”,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等等,振聋发聩,荡气回肠,浸透着诗词作者的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

家国情怀是古代文人士子对国家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度融汇和系统集成,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密码。展开中国古代诗书的浩瀚长卷,我们读到的是家与国的一体,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不读诗书,无以言志。当我们回望历史时不难发现,正是在古代诗书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滋养下,众多仁人志士特别是青年一代才厚植起家国情怀,这在以“救亡与启蒙”为时代主题的近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处在新旧社会转型时期的那一代人,儿时启蒙多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从小浸淫在孔子、司马迁、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人的典籍和诗词中,聆听着诸葛亮、辛弃疾、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等英雄的故事长大。因此,当国家和民族遭遇不测时,他们如同古代文人诗书中所抒发的,效法祖先大义凛然地写下慷慨诀别的《与妻书》,发出“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浩叹。岁月不居,时易流逝,家国情怀不仅是永恒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诗歌进入新时代,“讲品位、讲格调”诗人感到没问题,因为谁都不愿意别人说自己的诗歌品位低格调低,可是一说到“讲责任”问题就来了,一些诗人认为,诗就是诗,不必承担什么社会历史责任,任何诗以外的增加都使得诗不“纯”,在艺术评价上,认为只要是表现社会历史就觉得品位低下,一提到政治抒情诗,就认为是“时代的号筒”,是为某个集体或组织代言,许多人一看题目便扔一边了。

“大诗”与“纯诗”

海子说:“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在他心目中,只有“大诗”才是真正的诗歌。那么什么是“大诗”,各人的追求不同,理解也就不同,同时还涉及“大我”与“小我”“公共性”与“个人化”这些自诗歌诞生起就一直纠缠不休的问题。

陈仲义在《个人化与公共性》中说,公共性常常把写作责任与伦理放在首位。尤其在极端时期,诗歌自觉承担时代的道德律令,工具使命,实施诗歌最大的应用性敞开;个人化则要求更多是心灵化的诗意传递,关注自我心灵的秘密颤动,通过独特的个人语法、个人词汇建构个人化世界,纯粹和形式成为自足性的主要目标。他认为,在理想的层面上,达成诗歌写作自转与公转的平衡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也没有必要强求一律。某些倾斜、偏狭也有它的合理性。

每个人都有个人空间,但只要是社会人,就生活在公共空间里。即便没有碰到极端的情况,也必须要有公共意识,比如说车上不大声喧哗,不随便吐痰,不乱扔垃圾,“大诗”人肯定不可能在这种漠不关心“纯诗”的人中产生,而是在那些用个人的心灵感知和关注全车人命运的诗人中产生。我心目中的“大诗”:一是“大诗”一定是大格局,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空间,同时关注公共空间,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命运,同时关注人类命运,且有大的境界,大的胸怀,有大爱,有大能;二是“大诗”一定写了大的东西,可以是重大事件、大主题,也可以是爱情、战争、家族、青春等文学母题,像《长征》《2008,汶川大地震》一看就是大东西;三是“大诗”一定是大气的语言,当然它不一定使用很大的词汇,而是经过诗性组合之后呈现出一种高端飞拔的气质,营造出一种气场,带来的是一种震撼效果,而不是靡靡之音,不是技术性形容词的堆砌;四是“大诗”一定有大结构,要开阖有度,兼具创新性,整体上鼓胀着一种气势或气魄,而不是畏葸退缩,小巧玲珑。

“大诗”与责任

当下诗人同时面对两种责难:一种指责诗人不直接对社会历史负责,一种则指责诗人不搞“纯粹艺术”。当然,真正的诗人不会长久困扰于“是历史承担还是艺术迷醉?”这个二元对立的假问题,完全可以写出对艺术和社会同时负责的“大诗”。

美国“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在论文《诗人对谁负责?》中指出,“硬要诗人自认是社会秩序的立法者,这其实是要诗人丢开诗人的确切责任。诗人的责任本来很简单,那就是反映人类经验的真实,而不是说明人类的经验应该成为什么。任何时代,概莫能外。诗人对谁负责呢?他对他的良心负责,‘良心’一词,取它在法文中的含义:知识与判断的呼应行动。诗人的良心早就知道,在鉴别诗人是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严格、传统标准。无论怎样严峻的危机,都不应该被利用来使我们改变诗人与他周围的恒定现实的关系。所以,诗人对社会所负的责任绝不是按社会思潮或社会需要去编诗。诗人对什么负责呢?他只对他作为一个诗人应当具备的德行负责,对他的特别的艺术风骨负责;他的责任是精美地掌握他的话语,而且,这种话语不会减损他的意识所传达给他的关于现实经验的全部真实性”。这话说得既实事求是又精彩,对现代诗的本体和功能有着双重关注,在坚持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特殊的揭示生存/生命的功能上,取得了平衡。

首先,诗人要对艺术风骨负责,因为他的历史承担也同时是诗艺的承担,他的迷醉也包含着对历史之诗与思的迷醉。正如叶芝所言,“谁能将舞蹈和舞者分开?”诗有

写出对艺术和社会负责的『大诗』

□胡丘陵

诗的劲道,即便是承载历史文化,也必须诗意的承载。可诗歌现实中,尤其是宏大社会题材的写作中,它们以夸饰的宏伟激情,试图对称于题材的宏大,但多数给人以大而空泛的感受。这里,诗歌应有的心灵内凝的劲道,被巨大的“激情”蒸发掉了,其结果是诗人留下的既不是史,也不是诗,只是一个勉力呼喊的诗人形象。尤其是一些大型晚会的诗歌朗诵,毫无诗意,与其说是诗歌朗诵,不如说是煽情的讲述,这就没有对艺术负责。

同时,诗要对社会历史负责。这里的负责不是要成为“权威发布者”或者“代言人”,也不是要诗变成个人的私密日记,而是要接受社会历史的检验。这与要求一个诗人承担“天下大任”不同。尤其是在“大事件”诗歌写作中,不去复述新闻,不在表达公共事件时被叙事、细节所裹挟,而是要表达诗性体验,真实地表达内在经验,于诚朴中求真味,于直接中求隐奥。我们完全可以在诗与思的统一标准下写出既有饱满的社会生存和历史命名力量,又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大诗”与大众化

个人认为,诗的大众化,是以是“诗”为前提的大众化。不是“要使人听得懂,最好能够歌唱”,更不是明白如话、一览无余的通俗化。

先锋诗歌(或探索诗)是小众化的。这种诗歌超越当时大众语言水平和心灵接受水平,不断变化和创新修辞,甚至对传统语言和技巧进行颠覆与粉碎,且只有少数人才能解读其情感力量。先锋诗歌一方面给日常诗歌不断披荆斩棘开路,另一方面又不断为日常诗歌提供新的词汇。先锋诗人不断地在苹果上咬八个眼儿九个眼后再将之揉成泥浆。同时许多诗又很快为大众所抛弃,如同T台时装秀只能是少数人的表演,一般要5-10年才为大众接受,除留下某些元素,大部分将被残酷地淘汰,先锋诗歌对诗人的要求为最高与最低两个极端。要求最高的是先锋诗人必须具有优秀诗人必备的所有品质和天赋,要求最低的是那些只有勇敢精神而缺乏必备修养与控制力的“野生牛犊”也往往冲锋陷阵于这支队伍中。所以,诗歌永远是年长者向年轻人学习的艺术。

日常诗歌是“中文化”的。这些诗歌契合当时大众语言水平和心灵接受水平,直白地说,就是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能够读懂的诗歌,经典作品往往从中产生。“大诗”尽管契合当时大众语言水平和心灵接受水平,但由于它是交响乐,大多数人数静不下心来读,本来中文化的诗歌也变成小众化的了。

诗歌传播或诗教是大众化的。这就是诗歌大众化的要义,也是诗歌的问题所在。现在大家觉得诗读不懂,首先是诗教没有大众化。翻一翻对青少年进行诗教的中学语文课本,看看其中的当代诗歌,12册中,在初中语文第三册才出现余光中和席慕蓉的两首《乡愁》,在高中语文第三册(试验修订本)才有舒婷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梁小斌的《我热爱秋天的风光》、韩东的《山民》、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幼儿园“鹅、鹅、鹅”开始,差不多读了15年诗歌,才“春暖花开”一次。阅读落后诗歌如此之远,怎么可能大众化?现在网络诗歌很活跃,于是提出要重视网络诗歌写作,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有问题,应该是重视优秀诗歌的网络传播,而不是网络诗歌写作。

当然传播过程中涉及诗歌批评问题。个人认为,诗歌批评一是要检测出诗歌中的营养成分,二是要引导大众趣味,三是要真诚地细读文本。最后要说的,诗歌要有自信。诗人人都很自信,但诗坛不自信,权威话语不自信。小说有40年40部,诗歌就确定不出40部来,如果我们连肯定什么作品都不能做,那么势必结束了诗坛混乱的局面。只有旗帜鲜明地肯定一批导向性文本,加大传播力度,诗歌才能真正大众化,才能使诗人写出既“甜美”又“有用”,既对艺术负责,又对社会历史负责的“大诗”。



些人冒充“学贯中西”,摆出一副学识无边纵横天下的架势唬人。其实,几十年前,就有中国学者劝告国人,不要太看重西方文艺标准,因为西方人还不能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字的美学意义。

当代文人需要共同守护母语的尊严

近30年来,中国的许多行业在改革创新大潮中锐意进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人文领域,细细想来,总是不尽人意,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代表人文气象的文艺创作,对母语至今没有创新和发展,至少没有形成创新和发展的气候。没有形成气候的原因十分复杂,最根本的一条,或许是创作者们的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使用汉语言为母语的写作者们失去了对母语的倚重和深入研究。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基本关注,那就是对生命的大爱。母语和文字永远为生命而生,为生命而亡。只有母语,才能坚定而准确地叙述“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不能使母语蓬勃发展,但至少也要在我们这一代坚守母语的尊严。